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三輯 第一冊

史學先秦史研究論集

大陸雜誌社印行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三輯

第一冊

史學先秦史研究論集



大陸雜誌社印行

1377

序言

一、大陸雜誌史學叢書前已發行兩輯，本編為第三輯。第一輯於四十九年冬出版（現已三版），內容採自本誌第一卷至二十卷各期之史學論文。第二輯於五十六年春出版，內容則為本誌第二十一卷以迄三十卷各期之史學論文。本編—第三輯即從第三十一卷第一期至三十八卷第十二期為止所收史學論文。凡二百十八篇，都一千九百二十八頁，分為五冊。

二、本編—第三輯仍依斷代分列，為排順序，悉如前例，惟每一時代之論文，多寡不同，故分冊時與前兩輯或有不同。茲列舉如下：

第一冊 史學・先秦史 三〇六頁

第二冊 泰・漢・中古史 四七六頁

第三冊 宋・遼・金・元史 三八〇頁

第四冊 明・清史 四二〇頁

第五冊 近代・外國史 三四六頁

三、其他所欲言者，在第一輯編輯例言，及第二輯弁言中已盡言之矣，茲不復贅。

#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三輯

## 第一冊 史學·先秦史研究論集目錄

中國文化對世界應有之貢獻	陳立
華北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類別、分佈與編年	李勞
幾種古代史上不成問題的問題	周策
說「史之闕文」	周祥
說「史之闕文」增補五點	金祥
甲骨文無十四月辨	楊聯
歷史與語言	田倩
「中國」與「華夏」稱謂之尋原	柴爾德
人類史的時間的尺度	藍天益
從審長類行為看人類社會生活的演化	許澤民
工具與人類的演化	許澤民
古代郊祀之禮	黎正
南海狼牙修為山東鄆耶地名層化說辨誤	王家儉
印刷術西傳運動中的紙牌	胡志偉
十九世紀西方史地知識的介紹及其影響	馬幼垣
濟南縣碑	蒲英君
濟寧縣碑	范廷樞
濟寧縣碑	王家儉譯
一	五一
八二	七九
七九	七五
七五	六二
六二	五七
五七	五四
五四	三八
三八	二二
二二	一九
一九	一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循吏——游俠列傳）	施	九三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吳太伯、齊太公世家）	施	九七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燕召公——衛康叔世家）	施	一〇一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宋微子、晉世家）	施	一〇七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楚世家——鄭世家）	施	一一三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趙世家——韓世家）	施	一二一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孔子世家）	施	一二七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陳涉——曹相國世家）	施	一四九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留侯——三王世家）	施	一五七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五帝本紀、夏本紀）	施	一六七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殷本紀周本紀）	施	一七八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殷代的車）	施	一八九
論殷周時代高層建築之（京）、崑崙與西亞之Zikkurat	楊石	二〇五
論商代月食的記日法	高作	二〇七
殷人尚白說質疑	張璋	二一三
殷代的繪畫	希然	二一七
箕子入朝鮮之真象及早期中韓關係	林趙	二二七
	偉譯	二三〇
	如仁	二三六
	勉	二四〇

周代中韓關係與測古中國思想大家——周公	衛挺生	二四五
春秋蜀國	加藤常賢著	二四九
春秋薛、許、小邾三國別紀	洪順隆譯	二五三
春秋英、密、邢、茅、庸五國別紀	陳陳	二五七
春秋曹滕陳申四國別紀	陳陳	二六三
春秋時代的代、鄖、毫、東夷、大禹、翟繢之歲	陳陳	二七一
春秋時代的鄭叔	陳陳	二七九
戰國法家思想概述	吳張以仁康	二八六
戰國策札記	二九一	二九七
	二九七	二九七

# 中國文化對世界應有之貢獻

陳立夫

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在中華民國聯合國同志會紀念世界人權節第十八周年  
講演會講詞。

開會講話 何應欽先生

立夫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志：

本會此次演講會本來預定於十二月十日第十八屆世界人權節舉行，後來因為立夫先生已經先有約會，所以改在今天舉行。世界人權節是聯合國頒佈世界人權宣言的紀念日，世界人權宣言的宗旨，在保障世界全人類的基本人權與自由，也是聯合國崇高理想之一，所以為我們所支持與擁護。尤其是今年共匪在我大陸堅強紅衛兵普遍作亂，掀起所謂「文化大革命」，殘酷地迫害大陸同胞的人權與自由，並企圖徹底推毀我國文化，我們要發揚世界人權宣言的基本精神，團結一切力量，打倒共匪暴政，解放大陸同胞的自由。今天座談會的主講人陳立夫先生，獻身革命數十年，過去在軍政各方面擔任過極重要的職務，而且在北伐抗戰以及剿滅等重大的時期，對國家都有很大的貢獻，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用我在這裏詳為介紹。不過有一點要特別介紹的，就是本會在國際聯盟同志會時代，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本會改組為聯合國同志會初期，立夫先生都擔任過本會的理事，而且對於會務非常熱心，贊助甚力。所以今天就請立夫先生來本會演講，特別感到親切，也特別高興。今天立夫先生主講的題目是：中國文化對世界應有之貢獻，在紀念世界人權節第十八周年，立夫先生為我們開這個講題，其意義尤為深遠。我代表聯合國同志會同仁表示衷誠的歡迎，現在請陳先生開始給我們演講。

陳立夫先生講詞  
何長會，諸位先生：

何先生因為兄弟此次回國講道，要兄弟向諸位作一次講演。這個題目是有關世界之未來，或為貴會諸君所關切。兄弟在寫社論「四書遺言」時，於此略有一點心得，特向諸位報告，請求指教。在過去短短二十年中間，整個世界大大改變了，今日的聯合國所包含的國家，已有一百二十二個，已經數倍于聯合國成立之時。這就是說明殖民地政策已成過去，武力侵略的方法是錯誤而不可靠，惟有民族平等，國家獨立，相互諒信修睦，才能讓世界於和平之城與大同之治，亦就是孔子所說的「平天下」及闡父所講的民族主義。所以興滅國繼絕世，是必然的結果。今後如果有妄圖以武力征服世界或以組織控制世界，顯然是在問倒車，其失敗亦是必然的結果。欲知此種體制之所以造成的原因，第一是固父的三民主義的創造，第二是美國對華的外交政策之有獨立生與遠見。讓我詳細道來：

(一) 國父發明的三民主義，是集全世界進步思想的大纛，他是位醫學家，他看出了世界人類中有三大毛病：(一) 民族間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二) 國民在政治上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三) 國民在經濟上不平等所造成的。這三種病的症狀雖有不同，而其原因都是出於「不平等」，所以要治這些病，須得去其因，俗稱治本而非治標，本治則健康自然可以恢復。所以他對這三種病，開了三張藥方，這就是三民主義。

國父說明病因時稱：人類在進化過程中，曾經過長時期的「人與獸爭」的階段。在這階段所遺留下來的野蠻習性，造成了今日「人與人爭」的錯誤與悲劇，帝國主義的侵略思想及行為，以及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都是代表這一野蠻習性尚未完全消除。但是由於人類知識之日愈進步，科學之日見昌明，人類非得脫離野蠻而進入文明不

可；換言之，必須由「人與人爭」之階段進入「人與自然界爭以獲利」之阶段。這一階段是強扶弱，幫助弱者，來撫寧，以道德的力量，使不平等的能平。因為人類智能的不平等是天生的，是由先天的遺傳及後天的環境所造成的，但是人力可以勝天，可以用道德的力量，使之平等的趋于真平等。這就是文明的真義，亦是大同世界的理論基礎。

由於上述的思想，國父完成了他的民族主義。他主張全世界各民族應一律平等。由於這個基本思想，就產生了殖民地各國家要求獨立與自由。中國不獨是殖民地，而且是做了列強的共同殖民地，因父名之曰次殖民地。由於中國的文化以「士農一為重心，對於倫理道德或個人之道以及人與人相處之道，知道得最深透」而且平天下，向來深入民心，訖為是天地地矣。對於本國內一民族壓迫其他各民族的帝王專制政體所造成之內在與外來的不平現象，政治腐化，經濟破產，證明了三民主義是對症下藥的良方，由思想發生信仰，由信仰產生力量，一舉而推翻滿清專制，建立共和，進而打倒軍閥，抵抗日本侵略，取消不平等條約，使中國重獲人類平等的獨立自由與平等。

由於中國獲得獨立自由與平等，亞洲各殖民地國家亦隨而獲得獨立自由與平等，更進而影響及於非洲各國，使之重享人類應得之平等自由。追根溯源，不得不歸功于國父之民族主義思想之偉大。我們不能說此後在國際間得自由與平等，還進一步在政治上經濟上予以道義上之協助，使享平等之幸福。例如東洋耕作、勞務工作等。將來在平均地權及政治制度方面，亦或可以予以適當之協助。並且希望列強能順應潮流，改足過去的自大觀念，而為人類造福，亦即為其自己所造福。

(二)「何以美國對華政策之具有獨立性與遠見，能遠致整個世界之大大改觀呢？」要明白這個道理，必先瞭解美國立國之歷史與精神。美國的先民之所以首創移植于華土者，求宗教信仰自由與政治平等。在林肯總統的甘的斯堡著名講詞之第一句話已說得清清楚楚，雖然後來亦有為的是淘金財財而去的，當美國憲法在討論時間，

然弗通曾提醒大家勿僅注重個人財富權利之規定，同時須重視道德的責任，舉出孔子德本財末之教。所以中美兩國在精神上的融會，早已在美國獨立戰爭開始，而在其建見的大政治家的口中說了出來。而且美國的獨立成功，是殖民地脫離了東南第一個榜樣。美國歷代的政治家，都有對於中國政策發表過遠見的意見，有的謂美國外交政策如果忘了中國，就可以說是無外交政策可言。有的謂今後世界和平幸福，有賴於中美兩國的携手合作。因此美國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所敬仰，對於中國國內政治方面的情形，極為關懷。對於中國外交方面的指揮，不受西方其他國家對華政策之影響，而具有獨立之方針。曾憶在八國聯軍侵華之後，美國駐華一位使節，曾自勸赴歐洲各地為中國辯護，稱參謀之亂，為中國人被迫而出此。其責任應由若干列強負之，其主張正義之精神，世所罕見。

由于中美的傳統友誼，美國遂有華盛頓會議之召開，九國公約之訂立等等，有利於中國之措施。至于首先近四庚子賠款以充教育及留學經費，首先承認南京政府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為增進中美兩國友誼之遠見指標。由於美國本身之歷史，始於求自由平等而以革命方式獲得獨立，故對於其具有崇高文化而失去平等自由與獨立之中國，深具同情；于中國國父之傳統平等之偉大，不期然而然地予以支持。因此對於開羅會議中我國所提有關亞洲縱壓迫諸民族之解放各案，亦予以支持。聯合國成立，羅斯福總統並以中國為五強之一，凡此均非西方列強所心願而不得不遷就美國之政策者也。大陸陷後，五強之中之三強先後承認繼共政權，美國則單獨支持中國，始終如一。美國國會之態度，尤足表示美國民意之始終一致支持我國，獨於去歲之聯合國大會，美國之首席代表麥德柏，或于姑息份子之宣傳，忽然提出與美國傳統政策相違之支持兩漢中國案，其結果歸於失敗。

美國若一旦改變其對華之政策，無異自認無外交政策可言，無異美國的先民之所以首創移植于華土者乎？而且聯合國一旦可討論兩個中國，何以不能討論兩個德國，兩個越南，兩個韓國？是聯合國成為瓜分列強之機構，「聯合」兩字之悲哉全失，其本身就不存在乎？

信金矣，是爲觀者所痛，仇者所快，實爲最無政治眼光之黨派，而爲美國對華政策上留一大污點也。中國現有一萬多留學生在美國，由予美國之友愛中國及慷慨態度，個個都得到求學與工作之機會，如一旦美國助我反攻大陸成功，此一萬餘學生必將遂國建設國家，中美在經濟方面之合作，必更加強，此則爲敵人及友領者所最嫉妬，不惜以全力破壞中美之友誼，而到處在美爲共匪張目者也。其最可惡者，爲似是而非，一知半解之理論，出之于所謂「中國通」如齊正清之流之口，此君輩以中共爲農村改良者以欺騙美國人，今復以中共爲中國文化之繼承者，欺惑美國人，大言不慚，此則以敵人及友領者所最嫉妬，不惜以愚者爲此。深望國內諸學者，對於此類頗慮，予以正義之設序，使吾國人真正瞭解中國，即所以增強美國政府對華傳統政策之自信，亦所以維持美國之自由世界領導地位，而有利于我反攻復國之神聖使命也。

以上所述，爲開明今日聯合國中何以會有一廿廿二國代表集議之由來。茲再說明中國文化對此新世界應有之貢獻。

欲知一國文化之特點，必先瞭解一國極多數民之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爲何？中國以往無論在精神或物質方面對於人類均有不少之貢獻。英人 Joseph Needham 在其七卷本大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已詳爲敘述。及中國受全世界所有帝國主義者之聯合侵略而居于此殖民地之地位後，中國文化漸漸落伍，此時西方國家由於自然科學之發達，工業建設之猛進，中國愛不平等條約之束缚，一切進步進程，遂致貧弱迄今。然而中國文化以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爲士農工商，其實心亦寄于士農，志士道，農重于耕，故對於倫理道德做人的道理以及農業技術兩方面，均有大發明與貢獻。至于工商方面之發明與貢獻，則遠不及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該論倫理道德及農業技術之貢獻者，分別說明之如次：

中國所稱之「士」即指管人的人（Administrator）與教化的人（Educator）而言，此種人必須智德兼備，所以在智識勝人外，尤重以身作則的道德，因爲道德必須以身教而非以言教之故。惟其重德，故士必重義而輕利，輕利則安貧，重義則樂道，安貧樂道遂成士

之本色。農民安土重遷，樂耕而居，故重視倫理，愛好自然。所以孔子之教重倫理，尚修身，而老子之教之留學者亦僅爲一部「道德經」。四書中之大學，定禮取之小戴禮，論語爲孔子答弟子時修身之教材也。四書中之大學，定禮取之小戴禮，論語爲孔子答弟子及弟妹時與問答，而接聞于夫子之語。孟子則採之于子部，宋時始將四書以充民間通俗之教材，四書五經遂成爲中國思想文化之中心。老子之教，好比自然科學中之純粹理論方面，深奧而精微。孔子之教，則好比自然科學中之應用方面，實用而普偏，惟其易知易行，故能深入而持久，二者均以做人之道爲歸宿。余故以「本于大公，發于至誠，歸于求仁，成于力行」十六字爲孔子之教之結論。亦爲中國文化重心之所寄。

孔子深切體認世界一切問題，均是人的問題。人與人的關係（倫）及情愛（仁）之確立爲一切問題之先決，而人與人之倫理關係始於夫婦。無夫婦則無父子與兄弟關係之確立，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婦」。夫婦既爲五倫之始，儒家自成爲治國之基本與修身之目的。惟情愛（仁）之基礎，則建築在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之間，以其自生至死，其相互關係之久遠存在也。○父（母）子（女）兄弟兩倫之確立，其重要性等乎夫婦之久遠存在也。○父（母）子（女）兄弟兩倫之確立，其重要性等乎夫婦之久遠存在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又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仁之本也。」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斯文二者是也，厚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由此可知德之基礎在仁義，故易云：「立人之極，曰仁與義」，而義之始基在孝弟，其節文與和樂在禮樂，禮樂之成文爲法律。是故修身以道，齊家以德，治國以禮法，平天下以大道，（故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其道一也。○情愛之擴展，由於父子及君（長官）臣（部屬），由兄弟及于朋友，由親及友，由私及公，由小而大，是修身而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均爲仁義之見諸于行。○傳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宗也。」又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如此則五倫備而人與人之相處各得其適。故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曰，「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故一國之國民道德之墮

落，必先由家庭制度崩潰開始，家庭之崩潰，必先由男女間淫亂開始，而飽暖又為淫亂之起因，故吾祖先以戒淫率性為修身之要者，倡

袍蕩褲道為士之本色，而非以此為舉人期之也。仁愛既以孝弟為本，則寡家豈能令孝弟而言其他。夫婦之愛，始子成年，不足以之為本，舍本逐末，非可以久也。道德為人類共生共存之原理與應用，五倫者，人與人共生共存之具體規定與實行，故曰「本立而道生」。

仁字從二從人，開為羅繫人倫之本體，惟如何乃能使「仁」宏揚，必先知仁與行仁，知仁在智，行仁在勇，故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道也」。而其原動力則在于「誠」，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謂？曰：誠為天之道，亦為人之道，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一書，為開明誠與中之全體大用。稱「誠」為智慧，為仁愛，為力量，為信仰，為萬物之主宰，為先知，為偉大，為萬能，與西方聖經中開明上帝之義，一而二，二而一，故曰「至誠如神」。誠意正心，遂為修身之先決條件。

誠以成己，仁以待人，此乃世界上一切宗教所共同要求者，中國則盡納之于教育之中。故中國本身雖乏具有形式之宗教，却已具備宗教之實質，將來科學發達，亦無影響于做人之信仰，此則中國文化之優于西方文化者也。

此外中國自古以來，有一傳國之寶訓，名之曰「中」，「中」者，不偏，無過無不及之謂，以名詞言，為「精神的重心」，與西方所發明之「物質的重心」具有同樣之重要性，以形容詞言，為恰到好處；則盡納之于教育之中。故中國本身雖乏具有形式之宗教，却已具備宗教之實質，將來科學發達，亦無影響于做人之信仰，此則中國文化之優于西方文化者也。

此傳國之寶訓，名之曰「中」，「中」者，不偏，無過無不及之謂，以名詞言，為「精神的重心」，與西方所發明之「物質的重心」具有同樣之重要性，以形容詞言，為恰到好處；則盡納之于教育之中。故中國本身雖乏具有形式之宗教，却已具備宗教之實質，將來科學發達，亦無影響于做人之信仰，此則中國文化之優于西方文化者也。

平，發而中節則和，和平之基礎莫矣。中國人崇禮尚義，愛好和平，其原因在此。

故中國文化以「仁」為其本體，以「誠」為其動力，以「中」為其重心。鼎足而三，穩固而不變，可大可久，故曰「悠久無疆」。此一原理之發明，誠為人類之福音，可供世人之學習者也。

其次為農業技術與經驗，亦足以對人類有重大之貢獻。很久以前美國有若干種蔬菜，曾由一中國人帶往美國播種，此人死之日，美國全國旗下半旗誌哀，以示感念，此為一美國朋友告余之故事。而美後余將盡其姓名奉告諸君。我國華僑滿佈兩洋各地及亞洲各國，彼等深將倫理道德帶往各該地外，並將農業技術與經驗帶去，土人受其賜也。誠非淺辭。今日亞洲各國，獨得獨立與平等，華僑之力，豈忘忘懷。今日我國之農耕隊，又已滿佈于非洲各國，列威教人播種五穀蔬果及蔬菜，以助彼等改善生活方面之第一要件——食。列威殖民主非洲，幾及一世紀，竟遭當地人民最嚴重的吃飯問題，而不為之解決，有己無人，是為不仁，宜其失敗也。中國人以美味之菜肴，供世人享受，世界各地，均有中國飯館之間設，中國國旗，二十四小時無日落之時，誠足自傲，其所以致此之原因，為中國對蔬菜之烹調具有特長，與肉類混合或單獨烹煮，均美譽無比，此則更可證明中國人對於農產品在應用方面，對於人類有極大之貢獻也。

今而後吾人除以士農之所長為人類謀幸福外，尤應在工商方面，與西方國家尤其美國合作，為人類服務，為人類造福。必須全人類獲得平等之享受，世界始有真正之和平。蓋在英文之真義為 *Harmony*，先有兩極，明其兩極，乃得其中，故曰「極而明，而達中庸」，為所以平之真義為 *Equality* 才是和平之基礎，馬力憑財力不能達致世界和平。惟有道德，乃能強扶弱，幫助愚，使不和者和，不平者平，此一艱鉅任務，惟中美兩國之精誠合作，乃能底于成功也。

# 華北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類別、分佈與編年

李濟

此為文海《考古學》上古史編第6章，寫成於民國五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曾在台大用作講義。有先生註：文中所為最近五年之新材料，然大陸自開文化大學後，此種材料似甚少新材出現，故此一稿未經修改而復失其價值。承惠光示併以此謹存。

自民國十一年，安特生氏宣讀「中華遠古之文化」這篇論文開始（註一），四十年來，由田野考古所得的有關中國史前文化的資料，已經累積到了一個可觀的數量。最近又出版了兩部整理這類資料的書，它們都是用英文寫成的。一部是在英國劍橋大學執教的鄭德坤先生，他的大著為《考古學在中國》（Archaeology in China）（註二）。另一部為在美國耶魯大學執教的張光直博士，他的書是「中國遠古的考古學」（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註三）。這兩部書的寫法雖不一樣，但是他們的目的却頗有類似的地方，他們都用中國考古新發現的資料，講中國上古史。他們的講法確有見仁見智的不同，鄭德坤教授偏重各種資料出現的區域，加以排比（註四）。張光直博士有進一步的發現，他著重於文化的發展次序。很顯然地，當代的更學家，對於這些新出現的考古資料，有不同的看法；因着看法的不同，而採取個別的寫作方法也是很自然的。用這些材料的人，有一點不可思議的統間應該先注意到，就是這些刊佈的考古資料，究竟保存了多少原始性？說得更明白一點，我們要問問這些考古報告所依據的資料，可靠到什麼程度？這裏可以分兩點來考：一、收集這些材料的方法是否準確？二、記錄人或報導的人，是否因他個人的歷史觀，對原始資料有所選擇？

新石器時代這段歷史之所以引起廣泛的注意，乃是因為這些新發現的資料，對於解釋中國上古史，發生了重要的作用。由於大家廣泛地注意，在最近，它的發現數量上大為增加，對於這些材料的見解也加多了。因為有若干複雜的見解，所以各種材料的比重，也就因研究人的觀點不同而有不同。本章所採的資料，自然是以上述的見解發掘出來的為主體。不過所謂田野考古資料的可靠性，也有很不等的程度，上下相差很遠。就整體資料而論，其準確的程度也是很不一樣

的，錯誤的影響，往往比他種資料更為深遠（註五）。所以也要有限制地運用。至於廣泛的地面採集所得，號稱考古資料者，性質甚為龐雜，它們並不是完全都可用的，它們的取捨應該有一個比較客觀的標準，這一點便要看著運用人的見解了。否則我們便會陷入「以六經為注腳」同樣的錯誤。現在將若干有計劃的發掘及研究報告列舉於下，做為我們敘述的起點：

一、中央研究院所出版的有關考古發掘報告。

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的有關考古發掘報告。

三、中央抗戰後，大陸出版的若干考古發掘報告。

四、其他中國學術機關出版的有關考古報告。

五、日本考古學家發表的有關中國考古的研究報告。

六、其他有關的中國考古資料，如歐美各國博物院及收藏家發表的有關研究報告。

上面六類中，以第三類最為龐雜，但却包括不少發掘所得的原始資料，歷史價值甚高，且全世界史學家及考古學家所注意，所以我們也不能忽視。

歸納以上六大類資料，我們又可以把它們分成下列幾個組合討論：

一、有關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地面採集。

二、有關彩陶文化的發掘報告。

三、有關其他文化的發掘報告。

四、有關其他時代文化資料的報導。

關於地圖採集的資料，它們的歷史價值最難斷定，理由如下：

一、採集品與採集地沒有絕對的關係；二、採集品的描寫往往不

夠詳細，也許只有一個簡單的名稱，如石斧、繩紋陶片及骨蚌器之

類，對形制也沒有較明確的描寫；三，在同一採集地點的採集品，它們的相互關係也是不能確定的。以上是就一般的地而採集記錄而言。若是採集人有適當的訓練，他也許可以給我們若干比較詳細而準確的紀錄。紀錄的價值雖然仍有上項的限制，但根據這比較小心的紀錄，也許還可以做若干有限度的推論。我們要記住，往往很大的發現，都是根據這類資料，加以追尋出來的。所以這類資料的運用，需要大量的細心檢查。

我們首先要檢查的一批資料，就是最近為大家所注意的，即所謂「沙範文化」的地帶採集（註六）。據報告，這批採集品是在山西汾河下游的朝邑與大荔兩縣境內的沙丘地面採集所得。它們包括下列的種類：大部分屬於細石器這一範疇，製造的方法為間接擊打與壓裂法，材料用燧石、石英石、瑪瑙等；另外還有一批用直接擊擊法製成的石片器，及兩件磨光的箭頭，一枚蚌飾，一枚骨斧，但沒有任何銅片等。據報告人說，這些地面採集品都帶有濃烈的野氣，出現地點似非原生地點，全部採集品都埋在沙丘裏邊。因為它的產數很可疑（註七），不能把它當作一種獨創的現象看待；可是這是一處陷阱，是一個製造這一器物的工場，甚至於居住遺址；但這只是一種猜測。這發現的重要性是由兩種比較得來的：（一）在河套一帶所發現的更新統時期的舊石器文化，頗有類似的地方；（二）在若干形同與黑陶遺址中，用壓裂製成的箭頭是常出現的。所以這採集品的組合而論，它們表現了兩重關係。因為我們不能斷定它們本身的相互關係，我們只能說它象徵著華北文化由舊石器轉到新石器的漫漫階級文化的真正性質。

最近張光直博士根據沙範遺物的發現，對中國早期農業所開始，頗有所推測。他假定中國有一個新石器時代革命，而這件事情大抵發生在秦、漢、魏、晉交界的區域，即渭水、汾水流入黃河的那部分。他說這個地城做「中國生產經濟的搖籃地」。他所舉的理由是：「在華北氣候高潮（Climatic optimum）的時候，這個地帶介於在林窗帶的西方高原與低窪沼澤的東部平原之間，便於這

個時代的漁獵生活。勞倫特、布萊伍德（Robert Braundwood）及卡爾·哈爾（Carl Haile）認為這種獵鯉經濟是農耕經濟與畜牧經濟的前奏。因為有足夠的水量與溫度，使得水中的漁魚與山中的走獸一樣地繁盛。可以使這一帶的居民，靠着漁獵狩獵生活。第二，僅見的關於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也出現在這兒，即實難覈的渭水流成。第三，仰韶時代的農業中，漁獵仍占重要成份。這三點，雖然一時還不能夠證實，却有不少的旁證。把它與一千年的若干傳說相比，如神農氏之被五教於淇山之陽，及治被在陝西一帶的累躬，也有互相證的地方。尤其是初期農耕文化的仰韶文化發源地就在這個區域。張光直的這一說法雖然尚無考古的直接證據，但是他假定農業在中國早期的發展經過，確可以點活若干事實。關於神農與后稷的神話，各傳說並不一致，不過就地域的觀點論，總是指向黃河中下游一帶。最初被稱為農業，也與司馬遷所傳黃帝時代的情形可以比照。這與現代民族學上記載的事實也很相合。只是試考古發現的事實論，我們實在尚不能確定彩陶文化到底開始在什麼地方。到現在為止，有些史學家認為在安陽附近後周所掘到的最依唐文化，代表著仰韶文化的最早期。但是也有不同意此說的，認為那些簡單的彩紋，只代表一種「連珠的差異」，並不是「原始的藝術」。主張周易代表仰韶文化早期的，有周思承、吳金鼎等人。仰韶文化最高的發展，以在黃河左、右黃河、渭水及汾水沿岸出現者較多。已經發現的遺址，最為大家注意的為陝西西安的半坡村。

半坡村的發掘報告（註九），已經引起全世界的注意。鄭德坤氏在他設立所有的「考古學在中國」一書中，有一段比較詳細的敘述與分析。鄭德坤所說的考古學可以分為三部分討論，即居住遺址、工業遺址與墓葬遺址。先就居住遺址說起，這要代表半坡遺址的大部分。半坡遺址的全部面積約有萬平方公尺（東西長約 100 公尺，南北長約 200 公尺）。居住部分佔有這遺址的西部。所發掘出來的建築遺存，證明這個地方廢墟極廣。有一處居處的廢墟有六層之多，大多數都有兩層或三層。這一現象會引起兩個不同的說法：一個說法是認為這些房子為游移的農耕民族所建築。他們來來去去，在這兒住一陣子，放棄了

到別地方去，以後又回到這兒住，如此若干次數（註十）。另一說法是說此農耕民族一直在這兒住着，時間久了，房子壞了，便再重修，重建的次數可以多到五、六次。這兩個說法都是值得注意的，以後再評論。現在我們先看房屋建築的情形，照鄭仲德氏的分行，上層與下層有下列的分別：

層	內	牆	柱	屋	頂	柱	牆	柱	屋	頂	
上層	半圓形或橢圓形	在北面牆有一個腰帶形的牆面，約長二十分米，和圓形的牆上分別的其餘牆面。底端為圓形，內有木架，外表面向南面。	在北面牆有一個腰帶形的牆面，約長二十分米，和圓形的牆上分別的其餘牆面。底端為圓形，內有木架，外表面向南面。	柱子	柱子有寬窄不一的圓形，也有方柱，柱頭有圓形的其餘柱頭，圓柱頭為圓形，內有木架，外表面向南面。	柱子	柱子有寬窄不一的圓形，也有方柱，柱頭有圓形的其餘柱頭，圓柱頭為圓形，內有木架，外表面向南面。	柱子	柱子有寬窄不一的圓形，也有方柱，柱頭有圓形的其餘柱頭，圓柱頭為圓形，內有木架，外表面向南面。	柱子	柱子有寬窄不一的圓形，也有方柱，柱頭有圓形的其餘柱頭，圓柱頭為圓形，內有木架，外表面向南面。
中層	圓形而平滑	沒有圓形，像半圓形的牆面，約長二十分米，表面圓滑，有光澤，沒有凹凸。	沒有圓形，像半圓形的牆面，約長二十分米，表面圓滑，有光澤，沒有凹凸。	柱子	柱子有寬窄不一的圓形，也有方柱，柱頭有圓形的其餘柱頭，圓柱頭為圓形，內有木架，外表面向南面。	柱子	柱子有寬窄不一的圓形，也有方柱，柱頭有圓形的其餘柱頭，圓柱頭為圓形，內有木架，外表面向南面。	柱子	柱子有寬窄不一的圓形，也有方柱，柱頭有圓形的其餘柱頭，圓柱頭為圓形，內有木架，外表面向南面。	柱子	柱子有寬窄不一的圓形，也有方柱，柱頭有圓形的其餘柱頭，圓柱頭為圓形，內有木架，外表面向南面。
下層	圓形而平滑	沒有圓形，像半圓形的牆面，約長二十分米，表面圓滑，有光澤，沒有凹凸。	沒有圓形，像半圓形的牆面，約長二十分米，表面圓滑，有光澤，沒有凹凸。	柱子	柱子有寬窄不一的圓形，也有方柱，柱頭有圓形的其餘柱頭，圓柱頭為圓形，內有木架，外表面向南面。	柱子	柱子有寬窄不一的圓形，也有方柱，柱頭有圓形的其餘柱頭，圓柱頭為圓形，內有木架，外表面向南面。	柱子	柱子有寬窄不一的圓形，也有方柱，柱頭有圓形的其餘柱頭，圓柱頭為圓形，內有木架，外表面向南面。	柱子	柱子有寬窄不一的圓形，也有方柱，柱頭有圓形的其餘柱頭，圓柱頭為圓形，內有木架，外表面向南面。

實際上發現的建築遺存，大半屬於後期。這些住屋一般可分兩類：一種為圓形的，另一種為方形的或長方形的。圓形房子的屋基直徑可以達到三至五公尺。有一間房子周圍尚殘留着立壁，或直立地面，或向內凹曲與地平面呈弧狀的殘垣。高約二十二至三十七公分；厚度不均，自一公尺至一公尺。內壁面是堅硬的灰面，有些已經變作灰黑色。在牆面外延立長方形或半圓形的粗木柱，作為架構，以支撐屋子的重量。房子中間有一個葫蘆形的灶坑。灶坑兩邊有六個對稱的柱洞，分列於灶坑兩側，圓滿的壁中夾有長方形、三角形或多邊形的小木柱作為架構。兩隔牆之間相距七十公分，此處的居住面較屋內其他部分為高，與南邊接壤處傾斜而上，是出入門戶的通道。屋頂已燒塌下，從塌倒的部分，可以看出屋內大體成圓錐體；下面用木桿排列起來，上面塗一層或數層硬的燒紅的草泥土，厚在五至十分米之間，外表光滑。木桿直徑平均十公分。屋頂中心不作尖錐。

秋，可能是長方形平面，似乎和灶坑兩旁六個柱洞間的長方形範圍上相應，外衣和屋面為橫列的木板。其他的圓形房子，往往只有中間一根大支柱，這種房子的屋頂，可能就由這一根柱子支撑（註十一）。

長方形房子的牆，轉角大部分都成弧形。它們的大小與圓形房子類似，寬約四至五公尺；大門開至南邊，南邊有一門道。屋內地面與牆壁均塗以較硬的泥土。有些地面作半地下式，下沉的地面上時可達一公尺；為了升降方便，已經有了階梯，發現的階梯可多到四級。長方形房子中間也有灶穴。有一間比較大的長方形房子，長達二十公尺，寬十二、五公尺。用圓石保有寬約一公尺左右，半公尺高的矮牆。轉角是弧形的。牆面是灰白色的硬燒土，牆內為堅硬帶紫紅色的草泥土。屋內地面是光而硬的灰面，有些已經變作灰黑色。在牆頭上有一排柱洞，柱洞的排列是有規則的，近牆角地方，柱洞的排列較密。各個柱洞面是硬的燒土，部分還留有木紋紋痕。這些柱洞口徑平均約十四至十六公分。房子中間，有兩個身形紅燒土（註十二）——一個，直徑四五公分；由它的大小和位置看，當初似乎也有舟形柱圈，後來為燒糊的草泥破壞。在炭化殘木柱北邊，應該還有一個相同的柱洞，也是為燒糊草泥所破壞。這類大柱洞，從洞口到底部深一六公尺，在居住面以上全為堅硬的紅燒土所作成。下部插入半塊灰土層中，沒有硬的牆面。發掘人認爲這是被大火燒燬的房子遺址；他們也認爲在那時代，那麼大的建築，可能是一羣男性成年人羣居的地方（註十三）。

每個房子都有一個或數個灶坑，或燒火的牆面。灶坑和牆面多是由紅燒土做成。灶坑有兩種：最普通的的是葫蘆形的，表面是青灰色的硬燒土，周圍和底部是相當厚的一層純細的紅燒土；在這種灶坑的下面，往往有一個圓形的或同樣形狀的灶坑，做法和構造與前者相同。這類灶坑在上層的堆積裏出現較多，在下一層裏多爲沒有規則的灶面，只有一片燒紅的灰土面。這種灶面，往往不只一層，有厚達七八層的，厚度不一，皆堅硬如石（註十五）。

另一個與住宅相關連的，是貯藏東西的窖穴的發現。可以分成兩種不同的形狀。第一種是圓形的袋狀坑，大小兩類皆呈圓形，口小底大。小型的底部直徑平均一米左右，口徑約當其二分之一，這種灰坑都很淺，平均不到一米深。坑口完全在原來地面上的黑土層上，所以它是最早期的遺跡，裏面填以灰土、陶片、骨器、石器等。大型的袋狀坑，體積比前者要大一倍，多分佈在上層，它是比較晚期的遺存。周壁是一層硬的紅燒土和灰土粒。這類地窖出土有完整的陶器、石器和其他日常用品。第二種是圓角長方形坑，坑口部作長條形，坑的底邊都是圓弧狀，而不是直角，口部也是在原來的黑土面上，是最早期的遺跡之一。裏面出土物中，陶片較少，獸骨特別多，還有大的獸類的爪和牙齒（註十六）。

此外在這個居住遺址中，出現許多性質不明的燒土坑。坑壁皆有硬而光潔的燒燒面；坑的形狀有圓口尖底形的、圓口平底形的、細長如橢形的、橢圓形的。坑內填滿了灰土、灰渣、骨器、石器、陶片等。在下層還有一個特別的建築值得說明。就是一個圓形地面，直徑約六公尺。它的西北部和東南部分都被灰坑打破。其餘的部分，周圍共有一圈六十一個；地面上還留有三個長方形溝槽，槽深約十公分，槽壁兩面都有細木桿所壓的凹陷痕跡，並且有白色木炭。田野工作者推測這是豢養家畜的地方（註十七）。在這個遺址中，有豬、狗、羊等獸骨的出現。在類似的遺址中，也有若干馬、牛和鹿骨的發現（註十八）。

我們所謂的工業區，是指當時燒陶器的地點。這地點位於居住址的東邊。就留下的遺存看，那時燒陶器的窯，可分成兩類：第一類發掘的人稱作鑿穴窯，作大爐形狀。原報告稱這類窯作第二號窯。它的特點是一面為一袋形的大爐，爐口開在南面，為加柴火及除灰渣用的；爐口附近堆有許多灰燼。放置陶器的窯室，在大爐上面，但是大部分均已破壞。在窯室與大爐之間，有通大的大道，大道直達窯室。窯室中尚保有兩大道，直徑十五公分，長約三十公分。火爐周壁已成磚設，非常堅硬。大盤高一。三公尺，底徑一。九公尺。第二種火爐，發掘人稱作橫穴窯，作筒狀。這類窯室發現了五個，保存最

完整的一個，田野記錄稱為第三號窯。這種放置陶器的窯室與大爐以二道傾斜的粗大道相連絡。窯室底部呈圓形，平面光滑；周邊有一圈臺方形小火眼，其中有十個保存尚為完整。這一結構證明由大爐發出來的大，裡邊縱橫的大道，分隔由較小的火眼進入窯室。窯室邊已煙倒塌，不知其高度。但是從殘留的部分看，周邊有五至十八公分厚，當壁塗抹一層泥土，大道的長度在兩公尺以上。在另外一窯中，還發現未經燒造的粗陶罐兒坯。這些窯址都集中在一個地點（註十九）。

墓葬區占有半坡遺址的很大一部分。墓葬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埋葬成年人的墓葬，分佈在居住區的北邊和東北；另一類是埋小孩的墓葬，大都在居住房屋的附近。成人的墓葬共發掘出來一百三十餘座，其中有十五座陪葬品，不帶任何隨葬品。另外有六座二次葬，也不帶任何隨葬品；大多數都是仰身直肢葬。全埋在褐色灰沙或生薑石的硬土堆積之中，有的可深入地面上兩公尺左右。墓坑排列齊整，尤其在墓區中部和北部的一羣，一般都是頭向西，面向東。在同一水面上上發現的墓葬，排列的方向以及坑位的距離尤為整齊。隨葬品以陶器為主，大半放在腰帶或下肢骨的上面。每個墓中的隨葬品數目，可以少到一件，也可以多到十數件，最多的有十七件，平均以五、六件者居多。陶器的種類以粗陶罐、粗尾陶盆及小口尖底陶瓶較普遍，其次為著色的長頭瓶或壺、粗陶罐。隨葬品放置情形，尚有幾點值得注意，有些墓中是把幾個陶器器皿放在一起，小的裝在大的器皿中，很多用粗陶罐或彩色陶罐裝着，或者附葬。一個最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墓葬，形式與成年人的完全相同。蓋室長方形，長一。四六公尺，寬一。七至一。八公尺，深約一公尺。四周有木板的痕迹，已堅化作灰白色。楠木灰，厚約十公分，高約六十分公尺，東西兩端木板深入地下面，土中約半公尺，木板上似乎有一層「二層臺」。這類墓有種類多的隨葬品，脚下為一大底瓶，另有兩個細泥紅陶罐，蓋着一個粗陶罐及一

細毛紅平底杯。杯裏存有小米的皮殼。底上壓着三個小石珠。屍體脰周圍流有骨質珠六十三粒，左耳下有一用碧玉作成穿繩小孔的耳墜子。紅莽小孩的雙棺葬四十個，大半在居住遺址裏邊，似乎也有一部分的區域排列。陶甕是粗陶質，裏口用細陶飾或細陶盆覆蓋，覆蓋的盆有很多帶有花紋，完整的人頭和魚紋盆就是一個賣棺的蓋子（註二十一）。

由這些發現，可以推知在半坡居住的人，有一個很完整的埋葬制度。埋葬成年人與未成年人各有特別的方法。在每一區域內有固定的排列，頗然也可以分成若干階級。俯身葬在這兒的出現，也具有一種特別的意義。

半坡遺存中，最大的發現，應該是那盛在一箇小口大平底夾砂灰陶罐裏的糧食，據初步鑑定，這種食是粟類，學名是 *Sorghum vulgare* (L.) Beauvois (註二十二)。夾砂粗陶罐只是半坡豐富陶器中的一個時期。若以陶質來分，這豐富的陶器包括有細陶、細黑陶、夾砂粗紅陶、夾砂粗灰陶及細灰陶四類。此外尚有少數白色陶片，似為高嶺土所製。黑陶的制與細紅陶的形制沒有差別。器形可以復原者有二十種以上。比較重要的是尖底器、鬚形器、皿形器、杯形器、碗形器六種。三足盆的鼎形器很少，是值得注意的。若從文飾方面看，最普遍的是條紋，細質物的表面多飾以條紋，此外尚有弦紋、席紋、編條紋亦常出現，附加堆紋也很普遍，在夾砂粗陶器上最多；堆紋多挖成各種不同的形狀。另外一種特別的文飾是錐刺紋，多作三角形及圓形兩種，見於紅陶的腹部部分。半坡陶器似乎都是手製，很多保存有盤條的痕跡。半坡出土的彩繪不多，但是相當複雜，屬於盆形器、鉢形器、大口圓底器上文飾最多，最普遍的圓面繪葉紋和幾何形花紋。有名的人面花紋也出現在晚期的雙棺墓中。此外蟲形花紋還有魚紋和植物花紋。人面花紋的出現，已引起了很多的注意，由此我們可以推測這時代的若干生活習慣，如頭面部的裝飾，及有關頭面部的若干迷信。此外在半坡的發掘，有一個很可注意的發現，就是器蓋與器本身之間的關係。據報告：有好些破碎而重修修理作圓形的陶片，是用作蓋的。而一般的全形器蓋與所蓋的器，陶質常常不一樣，粗陶陶罐可以

用細毛紅陶蓋合在一起，破的圓足器底也可以當作器蓋用（註二十二）。這些很普遍的人類習慣，雖為一般人所知道，但是他們在仰韶時代已經養成了。這確是半坡發掘所得到的重要知識。少見但可能是高嶺土作成的白陶片，也是一個很要的新發現。關於陶器的形制與文飾，我們將來還要討論，這裏不再詳述。

除了陶器外，石器也出現了不少，總數在四百件以上，殘破的很多，大多數是磨製的。有斧、碑、鋸、鏟、環杵、錘、刀、圓球、磨石及斧（？）等。最普遍的石器有下列的特點：圓刃、營房、橫割面、長椭圓形；石斧則以小型的居多，石箭頭數量不多，以寬扁而短的、一式最普遍，有打製的與磨製的兩種，打製的以石英質石料，磨製的用紅色堅硬的石料，體薄而鋒利。石球可說是半坡的特產，磨得光滑，有規則，直徑在一、五至六公分，可能作為彈丸用的（註二十三）。此外骨器也在此遺址中發現了很多。包括骨鑿、骨孔針、鋸、鑿、箭頭、匕、魚鉤及骨片等。魚鉤及針的製作，非常精巧。骨鏹的形式很複雜，有三棱式、半圓式及三角孔頭式。一個長條形骨片，發掘人稱為骨刀，但光滑無刃，可能是用以製造或修整陶器的一種工具。此外還有一種尖圓形，一端甚為扁平的骨器，與骨鋸甚為相似，可能也是一種工具（註二十四）。

半坡出土很多殘破的蚌片，多作裝飾品用，圓形或環形，有的上面鑽有孔（註二十五）。

在現階段的史前史研究過程中，我們看半坡文化，可以有下列幾種認識：它的地點是在發現彩陶文化的中心，但是它所代表的階段，並不是這一文化最早的一期，因為它已經進到農業相當發展的程度，定居的證據雖不多，却已經富有村落文化的氣氛了。而且在若干習慣上，如商業的發展及墓葬制度的完善，都是一個定居社會的象徵。但是它們也顯然是在農業社會的早期，陶器完全還在手製的階段。遺址的包含證明他們聚落的範圍甚小。究竟我們應該把它放到農業社會的哪一段？尚需與其他農業發展的文化作比較後，才能決定。

現在我們再回來談彩陶文化的代表遺址，即河南省澠池縣的仰韶

村（註二十六）。這個遺址的重要性，及其所引起的爭論，都有些歷史的原因。它所以受重視的最大理由，就是因為——就現代考古學的中國發展說——在中國，它是第一個用科學方法發掘出來的遺址。但是由此也引起了許多現在而不能解決的爭論。

最早發現及發掘仰韶遺址的瑞典博物學家安特生博士，在他最後一次的報告中（註二十七），說明了他對於這個遺址的興趣，最初是由彩陶片的出現所引起的。起先他不相信他自己的眼睛，因為他覺得如此精美的陶器不可能在石器時代就有。所以他想到仰韶村所出的石斧與彩陶是否來自同一個文化層的問題。等他讀了若干考古報告以後，他漸漸瞭解了在中國及歐洲，新石器時代文化的一般情形，由此他對仰韶遺址發生了新的興趣。經他調查所的協助與努力，他得到中國政府的允許，便在仰韶村作了十次科學的發掘。發掘自一九二一年十月底開始，經過了一個多月，到二月初才收工。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仰韶村文化，就是這次發掘的結果。所以它的內容，我們應該有一個詳細的認識。

仰韶村所在的澠池縣，位於洛陽與西安之間，為周秦以來，西北交通要道所必經。縣城現在為隴海路的一站。在一個東西走向的山谷中，向北向南地勢都逐漸上升，形成帶斜坡的高原；由第三紀的紅土，和紅色土壤成，上面覆蓋着黃土。這一帶的高原，都為無數的三十至五十公尺深的深溝所切割；這些交錯分佈的溝都通連澠河流域。高原的南面直達秦嶺山脈，北邊另有山脈，遮斷了更北邊的黃河流域。仰韶村的座落在北邊的山峯中。由澠池縣向北行到仰韶村，要經過很多的黃土深溝。溝壁都呈現着第三紀及第四紀的紅土和紅色土，下為上新統地層，上為更新統的地層。在這兩種不同的地層中，發現了許多動物化石，最重要的第三紀的馬化石（*Proboscid hippocration*），以及黃土內的駝鳥蛋（*Syracantholithus*）。

現代的仰韶村，位在兩個黃土溝之間，一個很窄的黃土礫脊上。這兩個黃土溝，土名叫做東溝與西溝。仰韶村的中心，雖在黃土礫脊上，但有一部分房屋建築在東溝的厲壁內，土名稱作「窩房」（註二十八）。村中的生活似乎是隨着一個古老不變的規範。天氣的變化

為村民最注意的一件事，因為附近的樹木很少，遇着大一點的雨水，可以把這些黃土地帶沖刷成若干小的或新的溝渠；深的溝也可以沖刷得更深。村民的日用器具有好多是保存着很古的形態。有的也許還殘存著史前人的樣子。

仰韶村的史前文化重要堆積，保存在村南的一處孤立黃土崗上，為東漢與西漢所包围。在另一地區，即仰韶村到縣城的大道途中，有一個小地方，即所謂的東支溝（Tung Tzu Kou），在這條大道降入黃土深溝底的區域，發現了三個地區，仍保有很多的陶片與木炭。在仰韶村的正南，文化層已消滅了，但在村內尚有若干零星的灰層。據安特生的估計，這個遺址整個面積約有二十四萬三千平方公尺。

安特生在現代仰韶村以南約一公里以內，挖了十七個探坑，這十七個探坑的所在地，都在一九四七年遠東博物館第十期中詳細發表了。據所發表的材料，安特生的觀察，有點確實是很重要的。一、他第一次斷定的是仰韶文化確實建基在黃土期內。二、他認定仰韶時代的這個區域的地點，是沒有這些深溝的，那時候的地下水水平比現在要高三十五公尺。三、他發現了若干地下墓穴，上口窄小，底徑較口徑約大一倍；深度有達兩公尺以上者。這些坑多為仰韶時代的文化遺存所填滿。

以上幾點，他在民國十二年第一次的報告中都已談到，它們的重要性尤為一般學術界所承認。在一九四七年發表的「河南史前遺址」一文中，他對出土物各坑地層作了詳細的報導。這是原始報告中所沒有的。在這個補充材料中，他所強調的一點，就是要說明仰韶出土的陶片，有紅色的、灰色的、和黑色的不同。這三種陶器均難見於各層，並無上下或前後次序可分（註二十九）。

在安特生的最後報告內，也有一段關於仰韶遺址中的埋葬紀錄。

這個埋葬集中在所發掘的第二探溝。埋手發掘的人為步達生及斯丹斯基（Stanisky）兩位教授。報告中有一個圖，詳細紀錄了所發現的墓葬地下情形。它們的深度，大多數約在地面上三至四點一五公尺之間，最淺的深約二點七九公尺，二點七九公尺以上完全是農耕土。

所有的骨骼的放置都是仰身的。頭大部分都向東南；這裏面當然也有若干例外。只有一個墓葬帶有五件隨葬陶器。安特生在他的「中國史前史」一文（註三十）中，詳細描述了這五件陶器，包括兩件有蓋的高湯盆，都是口沿，形如城子崖發掘器的下部；其中有一件帶有流；另外一件為平底罐。第五件為一圓足盤。其餘各墓，只有些小器物，是否為隨葬品，却不敢斷定。這個墓地的範圍與時代，我們很難作進一步的說明。很顯然地，它與安特生發現的更前實物一部分是相同的。現在我們可以進一步說明由這一發掘所得的實物內容。

在安特生民國十二年的第一次報告中，例舉的實物有下列各種：石器有石斧、有孔石刀、石杵、石環、石錫、石戈及石鋒輪等。骨器有骨鏃、貝鏃、有孔骨針等。陶器有陶彈丸及陶環等。陶器有彩陶（見原報告第九至十四圖版）、單色陶、印灰陶（見原報告第十五至十七圖版）。單色陶的形制有尖底、平底、圈足及三足等；即印灰所推想的由彩陶表現的西方文化，對中國遠古文化的貢獻。他並沒感覺彩陶以外，還有黑陶一個成份。拿他這部早期報告，與二十四年後，他在瑞典遼東博物館那樣第十九卷，所發表的講印韶文化的論述比較，尤其是他所說的仰韶遺物的幾分分布——把第二探坑與第三探坑的詳細紀錄都公佈了。但是紀錄中，對於他自己所用的名詞却是沒有定說——如黑陶、灰陶；不過他強調了一點，在第二探溝（註二）公分厚的六層中，從上到下，紅陶、黑陶與灰陶三種陶片都出現過。

在他所發表的紀錄中，對紅陶的說明較詳細些，但是黑陶與灰陶兩詞沒有清楚的界說，在他的圖版說明中，都把灰陶與黑色陶放在一起。這裏面包括下列的種類：黑、黑、黑、高腳三足盤、低腳三足盤、尖底器、平底盆、尖底罐、圓足盆、平底杯、各種平底與圓足的盆、碗、碟、高足豆等。

就他的最後這一級報導說，有三點很清楚：第一，他對於黑陶的認識，是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城子崖發掘以後的事。第二，他在重新研究仰韶遺物時，所追認的黑陶，確並不與城子崖的黑

陶完全相符。第三，在他費了很大的氣力，做了第二次研究後，似乎對於黑陶有了認識，自己仍沒有達到任何自信的程度，所以他再圖版的描寫中，把灰陶與黑陶始終混在一個大標題之內說。

關於彩陶部分，安特生說得比較清楚確實。彩陶的質料比較堅韌，氧化程度極不一致；有些內部完全是灰色的，有些由裏到外全為磚紅色，有很多陶片只有表面上帶有高度氧化的樣子。也有幾個很罕見的例子，外表呈磚紅色，裏面呈黑色，有四塊陶片是灰白色。安特生就形制把彩陶分成六類：第一類，小型蓋盤碗，直口薄唇；第二類、碗形器、內卷唇；第三類、碗形器，外卷唇；第四類、盆形器；第五類，球形容器；第六類、有頸容器。以上的形制，都是根據碎片復原的。在邵村發掘中，沒有完整的陶器。關於彩陶的文飾，印韶的彩陶，有紅底黑花的，也有白底黑花的；白底的形成，多半在陶器外裏另加一層厚白衣，也有加紅色陶衣的；然後才加黑色花紋；即紅衣的多半是發光的，加上黑色繪畫，給人以舒適的印象。安特生認為這是印韶彩陶的高華。彩陶的花紋大半由曲線構成，有凹邊三角形、圓點形、圓點帶加紅線，這些線條，與點在一起，構成不同的圖案，有麻狀的、方形的、長方形的。

印韶遺址的發掘，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無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件，引起中外學術各方面的注意比任何其他學術研究要多。但是按著田野考古的標準說，這一發現所包括的可靠事實，也只限於我們在這兒所列舉的。它的重要性，可以說大半由於陳現人首先認識了它的意義；而這個「首先」所得到的神秘性，又很幸運地被陸續發現的事實，加了大量的支持；所以一般人對於它的珍惜，達發現人在內，有時就失去了平衡，但是它的歷史價值，却是永遠存在的。我們要瞭解印韶文化的真实品質，還需要再做些比較工作。

印韶文化發現後的第三十五年，即民國四十五年的時候，在撫順招村不到五十公里的撫縣境內的廟底溝（註三十一），有一羣考古家發掘了一個與印韶文化類似的史前遺址。這個遺址的面積，據發掘的報告稱有二十四萬平方公里。這個遺址的發掘是在民國四十二年，發掘的工作前後進行了兩次：第一次在民國四十五年，九月三十日開始，